

【一般论文】

新加坡报刊小说的政治工具性转向  
以《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为中心

The Turn toward Political Instrumentality in Singapore Newspaper Novels: Centering  
on the Polemics between Chong Shing Yit Pao and Nanyang Zonghui Xinbao

高一宜<sup>1</sup>、徐威雄<sup>2</sup>（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Gao Yiyi, Ser Wue Hiong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Malaysia

Email: [gs64373@student.upm.edu.my](mailto:gs64373@student.upm.edu.my) ; [wuehiong@upm.edu.my](mailto:wuehiong@upm.edu.my)

Received: 26 SEPTEMBER 2025; Accepted: 3 DECEMBER 2025; Published: 15 DECEMBER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Gao, Y., & Ser, W. H. (2025). 新加坡报刊小说的政治工具性转向以《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为中心.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6(2), 41-71.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6.2.3.202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6.2.3.2025>

摘要

本文以1907-1911年新加坡《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为切入点，探讨论战如何影响此时期报刊小说的创作，使其沦为政治斗争的直接武器。在革命党与保皇党的激烈论战中，两报刊登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性”特征：《中兴日报》通过《想入非非》《保皇党真哭》等作品对保皇党展开攻势，对其“乞开国会”“妄图立宪”进行嘲讽，以寓言体等形式嘲讽立宪运动；《南洋总汇新报》则以《大话报》《纪侦探申与堡事》等小说揭露革命党“敛财革命”的“真相”，对革命党人进行人格诋毁与腐败指控，予以激烈回击。这种将小说社会功用性推向极致的现象，是“小说界革命”在南洋的特殊回响，当中国大陆的小说已经从“开口见喉舌”转向通俗化时，新加坡因特殊的政治生态形成“滞

---

<sup>1</sup>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sup>2</sup>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高级讲师

后性繁荣”，成为政治小说最后的实验场。尽管此类小说艺术性薄弱，但其强烈的现实介入精神，为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埋下伏笔。

**关键词：**新加坡报刊小说、政治工具性、小说界革命、论战小说、  
滞后性繁荣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olemics between *Chong Shing Yit Pao* and *Nanyang Zonghui Xinbao* in Singapore (1907–1911)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examining how these debates shaped the creation of newspaper fiction in the Singapor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urned it into a direct weapon of political struggle. Amid the fier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evolutionaries and monarchists, the serialized novels published in the two newspapers displayed a pronounced “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 *Chong Shing Yit Pao* launched attacks on the monarchists through works such as “Xiang ru feifei” and “Baohuangdang zhen ku”, ridiculing their advocacy for “petitioning for a parliament” and their constitutionalist aspirations, often through allegorical forms. In response, *Nanyang Zonghui Xinbao* countered sharply with novels such as *Dahua bao* and *Ji zhentan Shen yu Bao shi*, which sought to expose the “truth” of the revolutionaries’ “fundraising revolution” while engaging in personal defamation and accusations of corruption. This extrem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fiction represented a distinctive echo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of Fiction” in the Singapore. While fiction in mainland China was shifting from explicit political advocacy to popularization, the uniqu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Singapore fostered a form of “belated prosperity,” making it the last experimental ground for political fiction. Despite their limited artistic value, such works embodied an intense spirit of social engagement,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Singapore newspaper fiction; 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of Fiction”; polemical fiction; belated prosperity

## 一、新加坡：政治小说的最后实验场

1902 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主张，标志着中国文学观念的重大转型。他突破传统“小说为小道”的认知框架，将小说提升至“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强调小说具有“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社会功能<sup>3</sup>。“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让晚清小说开始关注社会功用，小说一时间成为“文学最上乘”。但这种“开口见喉舌”的文艺形式导致了新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割裂，这些“审美性”欠佳的新小说也在一阵高歌猛进后迎来了低潮。1905 年后，晚清小说创作出现明显转向，呈现出政治小说低迷而通俗小说走高的态势。新小说的实际写作逐渐偏离“小说救国”的理论口号，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作品大量涌现，最终形成娱乐风潮压倒启蒙思想的新局面。<sup>4</sup>

1905 年后，中国大陆小说呈现“去政治化”趋势，言情、侦探等通俗类型兴起。而新加坡因为政治流亡者的到来，成为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海外论战中心。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小说界革命”的理念在此地获得延续，形成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发展路径。从 1902 年到 1907 年，南洋地区新小说的发展存在着滞后性。<sup>5</sup>在晚清小说已经由政治功用转向对娱乐性的追求之际，南洋地区报刊的第一个小说附张“益智录”于 1905 年方才于《檳城新报》设立，据 1902 年梁启超发表“小说界革命”已过三年。<sup>6</sup>

---

<sup>3</sup>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于《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 1，页 14-19。

<sup>4</sup>李亚娟，《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1902-1911）》，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博〉，2009。

<sup>5</sup>本文所称“南洋”，在本文语境中特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新加坡为核心、包括马来半岛（今马来西亚西马地区）的东南亚华文区域，是清末民初华人下南洋的主要聚居地，也是革命思潮、维新思想与华文文学传播的重要场域。

<sup>6</sup>南洋第一份华人日报《叻报》1881 年创刊，1907 年《叻报》加编《叻报附张》，但其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主要是刊载一些游戏文字、诗词、粤讴等文学性作品，小说并未引起重视，仅有一些零星的笔记小说散见于“杂俎”栏目之中。直到 1909 年，《叻报》才开始在附张刊登小说。第一个在附张刊登小说的是檳城新报。1905 年以前，《檳城新报》刊登的文字都以古典诗词为主，附在新闻版上。1905 年 7 月，《檳城新报》发布“看看刊本报大改良广告”，表明：“增大附张，广求通信，印送新书，并有新著救国小说、新串时事、歌谣逐日排登。”宣告了开设附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刊登救国小说，并于 8 月设立了附张“益智录”，于 1905 年 9 月 2 日刊登第一篇小说《美人魔》。“救国小说”一词的出现很明显是受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与国内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但此时 1902 年梁启超发表“小说界革命”的宣言已经过去了三年。这则广告的刊登可以侧面地证实，引发中国近代文学界“大地震”的“小说界革命”，起初并没有在南洋得到及时的回响。

1907 年，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创办发行，创刊号便专开副刊“非非”用以刊登小说。该报首席主笔王斧，其小说观受到“小说界革命”的影响，认为“廿世纪之小说改良社会之活宝也，其势力足以左右人类”，将小说视为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启蒙工具。<sup>7</sup>此后，南洋报刊小说迎来了新变化，各个报纸纷纷设立副刊刊登小说。<sup>8</sup>

从 1907 年开始，南洋报刊小说进入井喷时期，以新加坡《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为例，两报在 1907 年-1911 年间刊登小说共 104 篇，其中政治题材作品达 68 篇，占比高达 65.38%，现将具体篇目罗列如下：

《中兴日报》所刊政治小说篇目			
篇目	作者	刊登时间	题材
《想入非非》	斧	1907 年 8 月 20 日-8 月 24 日	标“意匠小说”，
《崖山哀》	沧桑旧主 (何虞颂)	1907 年 8 月 26 日-11 月 1 日	标“短篇小说”
《狮醒》	斧	1907 年 8 月 28 日	标“警醒小说”
《立宪梦》	沧桑杂录 (何虞颂)	1907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28 日	标“小说”
《侠女》	沧桑旧主	1907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8 日	标“短篇小说”
《狮子吼》	陈天华译	1907 年 12 月 26 日-1908 年 1 月 6 日	标“救种小说”
《红衣女子》	金津	1908 年 3 月 13 日-3 月 23 日	标“短篇小说”
《真国耻》	留心子	1908 年 4 月 30 日	标“小说丛”
《国耻纪念》	哲	1908 年 5 月 14 日	标“小说丛”

<sup>7</sup> 斧军，〈斧军说部经已出版〉，《中兴日报》第 6 版（1908 年 3 月 23 日）。

<sup>8</sup> 《南洋总汇新报》于 1908 年 7 月 7 日刊载《吓坏留学生》，标“怪象小说”，作者署“劝”。自此开始了对小说的刊登；《星洲晨报》1909 年 8 月 16 日创刊，创刊之日便设立了副刊“警梦钟”为小说栏目，并刊登了短篇小说“俄将”，作者为谢太仓。

《说怪物》	慕汉	1908 年 6 月 15 日	标“寓言小说”
《亡国泪》	犹太·韦力庵著，恨海译	1908 年 8 月 8 日-10 月 1 日	标“政治小说”
《五年后之国会》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8 月 27 日	标“短篇小说”
《乞骨儿》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9 月 2 日	标“小说”
《发开口梦》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9 月 7 日	标“小说”
《梦中梦》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9 月 9 日	标“小说”
《哭皇天》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0 月 2 日	标“短篇小说”
《自了汉》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0 月 6 日	标“短篇寓言小说”
《凉血动物》	飞刀	1908 年 10 月 9 日	标“短篇小说”
《大懵》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0 月 14 日	标“寓言短篇小说”
《韩人怨》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0 月 28 日	标“白话小说”
《叫花子与强盗》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1 月 2 日	标“小说”
《你们别哭了》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1 月 3 日-4 日	标“小说”
《和融满汉》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1 月 5 日	标“短篇小说”
《作如是观》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1 月 7 日-11 月 11 日	标“小说”
《保囊主义》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1 月 14 日	标“小说”
《保皇党真哭》	哈哈笑来稿	1908 年 11 月 18 日	标“现象小说”
《哭出个粤讴来了》	侠民	1908 年 11 月 19 日	标“小说”
《新党铜传》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11 月 24 日	标“小说”

《小儿也会讲民族主义》	可人	1908年11月24日-11月25日	标“小说”
《拜盟》	未署作者名	1908年11月26日	标“小说”
《女道台》	未署作者名	1908年12月14日	标“小说”
《强盗世界》	未署作者名	1908年12月14日	标“短篇小说”
《丐妇多金》	未署作者名	1909年1月8日	标“小说”
《狐悲》	未署作者名	1909年2月11日	标“小说”
《包旺》	未署作者名	1909年3月24日	标“小说”
《新西游》	未署作者名	1909年3月26日	标“小说”
《雌雄剑》	莫等闲斋主人	1909年4月6日-4月7日	
《蓄屁机》	滑稽子	1909年4月27日	标“小说”
《两荚荳》	法·巴若夫著，未署译者名	1909年5月12日-5月15日	标“小说”
《作如是观》	铁汉	1909年6月1日-7月13日	标“短篇民族小说”
《双美脱险记》	轩裔氏译	1909年6月15日	标“侠义爱情小说”
《七年狱》	陈遗戇	1909年7月12日	标“任侠小说”
《文明猴》	译社会主义小说	1909年7月22日-7月23日	标“喻言小说”
《几道山复仇记》	法·大仲马著，未署译者名	1909年7月27日	标“革命小说”
《林中语》	未署作者名	1909年8月24日-8月26日	标“奇幻小说”
《女军人》	未署作者名	1909年9月7日	标“历史小说”

《中雷奇鬼记》	我 佛 山 人 (吴沃尧)	1909 年 10 月 28 日	标“短篇小说”
《卧游军港记》	未署作者名	1909 年 11 月 1 日	标“短篇小说”
《恶作剧》	未署作者名	1909 年 11 月 2 日	标“社会小说”
《此人中语》	臣	1909 年 11 月 3 日- 11 月 4 日	标“短篇小说”
《南洋总汇新报》所刊政治小说篇目			
篇目	作者	刊登时间	题材
《吓坏留学生》	劝	1908 年 7 月 7 日	标“怪象小说”
《照方服食》	劝	1908 年 7 月 10 日	标“写真小说”
《大话报》	毕	1908 年 7 月 18 日- 7 月 21 日	标“怪诞小说”
《纪侦探申与堡事》	劝	1908 年 7 月 27 日- 7 月 29 日	标“写实小说”
《恨恨恨》	毕	1908 年 7 月 28 日	标“怪象小说”
《自由花》	狂生	1908 年 7 月 30 日	标“怪诞小说”
《七夕会》	劝	1908 年 8 月 4 日-8 月 5 日	标“怪象小说”
《演说》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8 月 6 日	标“短篇小说”
《大话报迟迟出版之内 容》	谐	1908 年 8 月 7 日	标“怪诞小说”
《中元夜宴》	劝	1908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	标“活剧小说”
《帝王思想》	警	1908 年 8 月 14 日- 8 月 29 日	标“短篇小说”
《雪冤记》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标“小说”
《花少年》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9 月 4 日	标“小说”

《美少年》	劝	1908 年 9 月 8 日	标“怪象小说”
《王伦》	未署作者名	1908 年 9 月 28 日- 9 月 29 日	标“怪诞小说”
《虎狼窟》	豫东野人来稿	1908 年 10 月 2 日	标“小说”
《五虱大会议》	嘉定二我 (陈其源)	1912 年 2 月 8 日	标“短篇滑稽”
《冯和尚》	未署作者名	1911 年 2 月 10 日	标“小说”

数据显示, 1907-1911 年间《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刊载的华文小说创作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工具性特征。两报共刊载小说 104 篇, 其中政治题材作品达 68 篇, 占比高达 65.38%。具体而言,《中兴日报》78 篇小说中涉及政治内容的小说便有 50 篇之多, 占总数的 64.10%,《南洋总汇新报》26 篇小说中与政治有关的小说为 18 篇, 占比 69.23%。<sup>9</sup>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创作倾向, 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在新加坡的特殊实践, 也反映了此时南洋华文报刊在特定政治生态下的话语选择。

## 二、论战背景与主笔群体

### (1) 从笔战到小说战

《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作为同盟会与保皇党在新加坡的重要舆论阵地, 其围绕政治理念展开的“小说论战”呈现出高度组织性与持续性。所谓“小说论战”, 是指两报在通过社论、时评等文体进行激烈笔战的同时, 所刊载的小说作品也主动呼应论战主题——革命派小说鼓吹民主革命, 保皇派小说宣扬君主立宪, 两类文本通过文学叙事强化了报刊的政治立场。本文将这种以小说内容配合报刊论战策略的现象, 定义为“小说论战”。

1907 年, 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创办发行。该报名称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首肯, 同盟会员将之打造成革命派在新加坡的舆论高地。<sup>10</sup>《中兴日

<sup>9</sup> 注: 本研究对“政治小说”的界定较为宽泛, 除直接宣传革命或保皇思想的作品外, 某些影射时事、记录穷苦人民生活、两家报社相互攻讦的篇目, 也计入政治小说。

<sup>10</sup> 《中兴日报》是中国同盟会于南洋地区创办的核心机关报, 社址设于新加坡吉宁街 13 号, 由新加坡同盟会会长陈楚楠、副会长张永福联合会员许子麟、沈联芳、邓子瑜、林义顺共同发起, 成



报》创办前，陈楚楠、张永福已经于 1904 年创办了《图南日报》，因经营不善与保皇党打压，于 1905 年停刊。停刊后，二人转而创办《南洋总汇报》，该报承袭《图南日报》的办刊基础，于 1905 年正式发刊，继续在新加坡推进反清事业，直呼皇帝名讳，不用大清国号，势将革命进行到底。<sup>11</sup>然而因为合办方混入了保皇派成员，张陈二人次年即遭排挤出局。此后，该报完全落入保皇派掌控，彻底背离革命初衷，成为了与《中兴日报》论战的主要阵地。

有关论战开始的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本文以彭剑的考证为依据，认为论战开始于 1908 年六月底。1908 年 2 月 17 日、18 日，《中兴日报》连登文章，对前《中兴日报》主编、现《总汇报》主笔何虞颂（天山）在敌对立场报刊就职表达不满，让其就君主立宪是否能实施、清廷立宪对汉人是否有利一事做出回应。<sup>12</sup>1908 年 7 月 31 日《中兴日报》所刊《亚警确不自量》中指责其“以多二三十薪金之故，而即可以背宗旨叛逆”。<sup>13</sup>张永福也曾回忆，何虞颂是在论战期间受了敌入的贿赂而投向《南洋总汇报》的。<sup>14</sup>

中兴日报前主笔王斧在挑起与《南洋总汇报》的笔战之中担任了颇为重要的角色。他先是在《中兴日报》1908 年 5 月 2 日刊登的文章《总汇报记者何虞颂之丑相》的按语里称其为“自私自利的食饭嫖客党”。<sup>15</sup>还在《总汇报记者何虞颂十大罪恶》中历数何虞颂之“忘恩”、“做贼”、“欺人”、“无耻”、“昧良”、“骗友”、“阴险”、“狡诈”、“负义”、“心死”十大罪恶，说何虞颂“由革命而保皇，为吾党的败类，社会的公敌”，不仅文章抄袭，而且狎妓被骗，面对《总汇报记者何虞颂之丑相》的指责，“何不比是省，悍然谬托通信，糊涂抵赖”。此外，王斧还提到，何虞颂在《南洋总汇报》的笔名为天山，但其“竟然登告曰，辩言天山未尝在过本报”，“天山非何虞颂欤”，“抑何虞颂非天山欤”。<sup>16</sup>据此可以推测，《南洋总汇报》也曾予以回复。

1908 年 5 月 6 日，《中兴日报》第二版刊登一则启事，辞退了王斧，并表明了自身立场：

---

为新加坡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报刊之一。

<sup>11</sup> 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 11。

<sup>12</sup> 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 18。

<sup>13</sup> 广博，〈亚警确不自量〉，《中兴日报》第 5 版（1908 年 7 月 31 日）。

<sup>14</sup> 张永福，《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页 111。

<sup>15</sup> 来函，〈总汇报记者何虞颂之丑相〉，《中兴日报》第 5 版（1908 年 5 月 2 日）

<sup>16</sup> 斧，〈总汇报记者何虞颂十大罪恶〉，《中兴日报》第 5 版（1908 年 5 月 5 日）

本报启示，启者仆近日因事务繁冗，未到报馆提理一切，而王斧自愿报效，分任附张文字，惟王斧连日杂作，皆涉及何虞仲个人私事，有伤忠厚，实于本报主旨不合，今特声明此后本报不愿受王斧之报效，登刊其文字，此布。本报监视员张永福，陈楚楠启。<sup>17</sup>

王斧对何虞颂的个人攻击，或许只是为这场论战提供了偶然的契机，而论战的必然性，则源于《中兴日报》自身对宣传革命党宗旨的需要。早在 1908 年 3 月 3 日，其所刊文章便说：

吾党所行事，大义昭著于环球，如日月经天，予人以共见、无事回避。然犹恐同胞未尽深明大义，久欲得一反对者，藉此辨明吾党宗旨之正大、事业之光明，普及于同胞，以达其实行之目的。<sup>18</sup>

因此，当王斧因与何虞颂的个人恩怨离开中兴日报以后，田桐负责继续向《南洋总汇报》下战书，在《与总汇报书》中直接提出论战：

- （一）立宪与革命两问题与一国人民性格及心理有何关系？
- （二）今日之中国，与各国当日立宪之时代及人心，果有无同异之点？
- （三）立宪事业，抑由于政府及二三儒者所愿意而成立乎？抑或由于一般国民心理之趋向而成立乎？
- （四）今日汉人与满人组织立宪政体，必经如何手续而始得成功？
- （五）立宪之后汉人得居如何地位，得享如何权利？

附则

- （六）答办[辩]不能清翻白描，须根据事实及法理。
- （七）答办[辩]不能故延时日，须于《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论文后即行登载，敝报之答办[辩]亦如之。
- （八）胜败决之于舆论，如以舆论无标准，则可在本坡开会，决之于举手之多寡。
- （九）如经众人判断胜败后，败者即行闭门罢业，万一以股东之便宜而不能闭门罢业者，则须即行改变宗旨，以从胜者之所主张（例如《中兴报》

---

<sup>17</sup> 张永福、陈楚楠，〈本报启示〉，《中兴日报》第 2 版（1908 年 5 月 6 日）

<sup>18</sup> 佚名，〈答叻报主笔三十日所覆本报书〉，《中兴日报》第 5 版（1908 年 3 月 3 日）

败则从《总汇报》鼓吹保皇，《总汇报》败则从《中兴报》之主张而立论）。<sup>19</sup>

战书一经下达，《中兴日报》渴望着《南洋总汇报》的回应。对方没有回应，它便又刊出《总汇报不战而遁》，直到《总汇报》1908年6月29日改名为《南洋总汇新报》，刊登康有为“长兴十大弟子之一”徐勤的《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作为回应，暗指孙党办报为欺骗华侨：“近年来，孙某为日本所逐，穷无所归，窜匿南洋，藉某机关报肆其诤张为幻、招摇撞骗之伎俩，以欺我华侨。”<sup>20</sup>自此，两报的论战正式开始，并从最初的政论交锋，逐渐扩展到小说领域。

1907年8月，《中兴日报》率先开始政治小说的刊登。从1907年创刊到1908年6月，《中兴日报》相继刊登了9篇与政治有关的小说，用以呼应自身革命立场，切合其办报主旨。其中，《想入非非》、《崖山哀》、《狮醒》等多为醒世谏人，呼吁民众关心救国存亡，《真国耻》、《辱佛节》表达对清廷统治的不满，何虞颂的《立宪梦》则对保皇立宪加以讽刺。1908年6月以来，《中兴日报》刊登政治小说的数量陡然增加，8月至11月便刊登了20余篇小说，推崇排满革命，暗讽政敌保皇党，《发开口梦》、《梦中梦》、《哭皇天》、《大懵》、《你们别哭了》、《保皇党真哭》、《哭出个粤讴来了》等小说甚至直接对保皇党进行攻击嘲讽。

1908年6月，随着《总汇报》更名为《南洋总汇新报》，接下《中兴日报》的战书后，《南洋总汇新报》在7月到8月共刊登了12篇政治小说，如《吓坏留学生》、《照方服食》、《大话报》、《纪侦探申与堡事》、《恨恨恨》等，其中一些作品更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兴日报》报馆人士，双方论战呈现激烈交锋之势。通过分析论战前后《中兴日报》刊登与保皇党有关小说的数量，以及《南洋总汇新报》在接受论战后刊登与革命党有关小说的数量，可以认为，两报论战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时小说内容的选取与主旨的确定，这些小说不仅明显服务于各自报纸的政治立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攻击对方阵营的舆论工具。

<sup>19</sup> 恨海，〈与总汇报书〉，《中兴日报》第2版（1908年6月10日）。

<sup>20</sup> 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18。

## （2）主笔的取向

《中兴日报》的主笔王斧，以其小说创作作为社会改良之工具，极大地主导了其主笔的《中兴日报》的小说倾向。王斧（1880-1942），原名家春，又名釜，号斧军，玉父，广东琼山人（今属海南）。1901年王斧赴香港期间结识了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革命党人，由此接触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190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前，他的报刊活动集中在香港、新加坡及泰国，先后参与《民报》、《少年报》、《人报》、《唯一趣报有所谓》、《香港少年报》、《中兴日报》、《华暹新报》等多家进步报刊的编辑与撰稿工作，通过政论文章传播民主革命主张，尤以小说创作为核心。

在主笔《中兴日报》之前，王斧便在多份报刊上创作发表了作品，笔名包括“虎军”、“斧”、“亚斧”、“父斤”、“粗斧”、“阔斧”等，在《有所谓报》（1905）、《香港少年报》（1906）等报刊上都创作颇丰。1907年王斧受孙中山委派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笔政，在创刊号上专门开辟了副刊“非非”为小说划出固定的刊载板块，首版便刊登了为该报专门创作的“意匠小说”《想入非非》。<sup>21</sup>

王斧出版有作品《斧军说部》<sup>22</sup>，《中兴日报》在1908年3月23日还刊登了《斧军说部》已经出版的广告：

廿世纪之小说，改良社会之活宝也，其势力足以左右人类，尽人知矣。斧军自从事报界，注意于此，因衡情度理，鼓义侠之潮流，作强权之针砭，俾尽言责焉。其主义之高尚，文笔之繁华，意匠之光明，精神之活泼，每读一过，大有龙吟凤舞，海立山飞之概，其价值为海内外人士所称许也久矣。顷陆续付梓，汇成一帙，现已出版，每册定价五角，欲购者幸其速来。兹将目次列左：楚南先生赠序，星洲寓公题词，精卫先生序，星洲寓公序，弁言。民族义侠《奈何天》，绘情义侠冒险《匣里霜》，外交复仇《威家铲》，冒险《千钧一发》，任侠民族《闷葫芦》，迷情《双鸯梦》，侦探《海底针》，任侠《巾帼魂》，义侠《天涯恨》，艳情《醋海

---

<sup>21</sup> 王斧在《中兴日报》上刊登的小说，除了《想入非非》，其余皆为转载自己从前在他报刊登过的作品，结合《中兴日报》的“附张”名为“非非”，因此笔者合理推断，《想入非非》为王斧专为开设副刊而创作。

<sup>22</sup> 本书已经散佚，据牛志威（2018）考证，革命党对《斧军说部》这本书非常重视，同盟会所办刊物《民报》创办四年以来，其是唯一得到“代理出售”之荣誉的小说集。

波》（又名《专制果》），意匠《想入非非》，纪事《五十年世界》，光怪《南无阿弥陀佛》，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短篇《牛背笛》。以下短篇：《茅店月》、《朱臻士》、《宝罗》、《智报》、《锦囊》、《醒狮》、《竞马》、《熊》、《蚁》。约售处：大坡吉宁街海通书局、振源栈；小坡琼州会馆左便万宝兴、大马路新同益。戊申年二月二十日，天声社谨白。<sup>23</sup>

王斧发表于中兴日报的小说有：

发表时间	篇名	署名	题前标注	是否转载
1907 年 8 月 20 日—8 月 24 日	《想入非非》	“斧”	“意匠小说”	否
1907 年 8 月 28 日	《狮醒》	“斧”	“醒警小说”	原为 1906 年 10 月 12 日 《少年报》刊载之《醒 狮》
1907 年 9 月 10 日	《喜怒哀乐 爱恶欲》	“虎军”	“七情小说”	原为 1906 年 10 月 21 日 《少年报》刊载之 《听》
1907 年 9 月 23 日	《锦囊》	“斧”	“短篇小说”	原为 1906 年 10 月 13 日 《少年报》刊载之《锦 囊》
1907 年 11 月 24 日	《阮古》	“虎军”	“短篇小说”	原为 1906 年 10 月 22 日 《少年报》刊载之 《熊》

通过考察王斧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他的创作高峰期实为 1905-1906 年香港撰笔期间，等到了 1907 年《中兴日报》主持笔政时期，除了为开副刊亲创“意匠小说”《想入非非》，其他刊登在《中兴日报》上的小说如《狮醒》、《喜怒哀乐爱恶欲》、《锦囊》、《阮古》均为以前刊登于他报的作品，内容也多与排

<sup>23</sup> 斧军，〈斧军说部经已出版〉，《中兴日报》第 6 版（1908 年 3 月 23 日）。

满革命有关。因此，《想入非非》对《中兴日报》小说风格的指导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开篇写：

中原板荡，沧海横流，凭足胡虏，神州破碎。立于今日悲风飒飒、长夜漫漫之亡国地位。徘徊异域、伤悲河山，麦秀黍离、伤心祖国。呜呼！丈夫生不能痛哭缟素，提刘邦之三尺，申项羽之三千。直扫虏巢，生啖胡奴之肉以为粮，而还我神圣不可侵犯之光复目的；复未能狭路相逢，挟一颗救世之灵丹，与媚异族、杀同胞，狗彘不食、臣妾牛马行之汉奸相周旋，而实行我唯一无二之铁血主义，则保皇助桀，爱寇讎如父母，戴羯狗如帝天。卖国求荣，甘犯不韪，亦当利剑相视，以头颅相交易，而显我大公无私。以治反对党者之天职如此，方庶几无愧于黄炎。盖吾辈既主张革命，伏尸流血，粉骨碎身，诚不可忌讳者，况天生男儿好身首，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岂可长此而终古乎？虽然事变之来，朝不继夕，彩云易散，明月难圆，风潮益益起，盘涡益益烈，吾恐吾想以对付人者，人将转以对付吾而更甚于吾之想以对付人。呜呼！吾想之！吾重想之！吾泪枯，吾神竭，吾想入非非。<sup>24</sup>

这篇文章虽标为“意匠小说”，却明显超越了纯文学的趣味追求，通篇贯穿着强烈的革命情绪，堪称其政论立场的文学延伸，是典型的革命派宣传小说。文章的内容皆为“排满革命”服务，提“扬州十日”，是为了让汉人想起清军攻破扬州城对汉人大肆屠杀的史实，从而对满清的统治更为反感。从整体上看，《想入非非》更像王斧的革命宣言，其侧重于情感动员而非理性思辨，作为《中兴日报》附张“非非”的开山之作，也为《中兴日报》其后小说的刊登定下了基调。

何虞颂的经历则有些特殊，他先任《中兴日报》撰笔，后转到《总汇新报》工作，笔名有“玄理”、“天汉世民”、“沧桑旧主”等。据黄曼在《晚清“海归”与小说》中提到，何虞颂归国后仍有创作。<sup>25</sup>来《中兴日报》之前，何虞颂曾经在香港的《中国日报》撰笔。<sup>26</sup>《中兴日报》创刊时，何虞颂和王斧一起主持笔政，后何虞颂于1907年12月21日辞退《中兴日报》的编辑职务，转为《南洋总汇新报》效力。

<sup>24</sup> 斧，〈想入非非〉，《中兴日报》第5版（1907年8月20日）

<sup>25</sup> 黄曼，《晚清“海归”与小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博〉，2013。

<sup>26</sup> 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27。

何虞颂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兴日报》，离开《中兴日报》转到《南洋总汇新报》后，虽有笔名天山氏，但未见他用这几个笔名发表过小说，至于其是否有其他笔名，现未可知。

何虞颂发表于《中兴日报》的小说如下：

发表时间	篇名	署名	题前标注	是否转载
1907 年 8 月 26 日-11 月 1 日	《崖山哀》	沧桑旧主	短篇小说	否，但有抄袭嫌疑，王斧指责其抄袭《珠江镜日报》、《崖山馀痛》
1907 年 9 月 16 日-12 月 6 日	《金锁连环》	天汉世民	迷骗小说	否
1907 年 10 月 25 日	《富人》	沧桑杂录	小说	否
1907 年 10 月 26 日	《立宪梦》	沧桑杂录	短篇小说	否
1907 年 12 月 14 日	《侠女》	沧桑旧主	短篇小说	否

有关何虞颂的小说观，可以从他在 1907 年 8 月 23 日《中兴日报》发表的《清廷又欲禁报耶》中窥得。在这篇文章中，何虞颂首先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启蒙价值，谈到俄国小说如何影响社会风气：

欧风东渐，时尚亦异，新闻学说，播诸华夏。报馆事业，屹然遂兴。然数十年间，频遭封禁……当千八百三十年间，铁沙政策之禁制，严酷极矣。然而动力渐发，文学革命，因而崛起，格里波得夫之小说大行，比圭黎之哲学愈著，自是而后，哲人踵起。<sup>27</sup>

与王斧小说中激进的革命思想相比，何虞颂创作的政治小说则显得有些暧昧。他 1907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8 日在《中兴日报》连载的小说《立宪

<sup>27</sup> 玄理，〈清廷又欲禁报耶〉，《中兴日报》第 2 版（1907 年 8 月 23 日）。

梦》，署名“沧桑杂录”，开篇便写光绪帝听信康有为的建议，发动政变，反遭被囚：

有一个人，姓老，名亚光，乃系某外胡种，他不幸生长在一个宫禁里头，耳无闻目无见的，就糊糊涂涂地做了三十二年的受难皇帝。前十年，给一个南海光棍当□他变政，他也不知所谓，就听那光棍的。……给他母亲知道，就将他关禁起来，那个光棍就一溜烟跑了。老光从此就像笼中的鸟，给他母亲拘束起来，一举一动也不得自由，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每日总是唉声叹气的。<sup>28</sup>

文章影射清季立宪，写外族傀儡皇帝“老亚光”（光绪帝）被囚禁深宫三十二年，前期受南海光棍（指康有为）操控，后期遭母亲（慈禧太后）严密监禁。某日，他草率颁布立宪诏书，却引发举国骚动。一时间，奴才们争相贺电，投机者连日上奏，老光不堪其扰。在谄媚者怂恿下，老光进行了表面改革，设资政院充塞老朽、更易衙门名目、增设闲职官缺。这些政策竟然离奇地震慑了列强，外国因恐惧“立宪后的中国”而主动归还侵占领土。老光大喜，封赏群臣，宴席间，众人猜拳行令，嚷着什么“一扫光”、“再走西安”、“下等奴隶”等暗讽时政之语。故事最终在革命志士徐锡麟突掷炸弹诛杀满奴汉奸中结束，老光惊觉是梦，面对雷雨怅然哀叹：“我们的立宪也是一场梦了”。

尽管是一篇讽刺立宪的文章，与王斧《想入非非》的激昂文字相比，何虞颂这篇《立宪梦》显然要温和许多，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光绪帝的同情之意，说他“不幸生长在宫禁之中”、“糊糊涂涂做了三十年的受难皇帝”、“像笼中鸟一样不得自由”。可见此时报人的政治立场也不是完全坚定，亦有为了金钱或谋生之所求而进行职业小说撰写的作家，报纸的政治立场也决定了其小说的立场。

何虞颂对革命的立场还体现在他的政论言论上。在1907年8月24日发表的《齐心与齐智识说》中，他谈到：“谈民族者以为非覆异族政府无以为治也，言保皇者以为非戴立现在之政府，为之极力效忠以排外难无以为治也”。<sup>29</sup>何虞颂将革命党与保皇党并之列举，可见他对保皇党并非深恶痛绝，同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出：两党之间之所以政见不同，是因为接受的知识结构不同，因此若想挽救时局，关键非在“齐人心”，而在“齐智识”，言外之意是只要“齐了智识”，两

---

<sup>28</sup> 沧桑杂录，〈立宪梦〉，《中兴日报》第5版（1907年10月26日-28日）。

<sup>29</sup> 玄理，〈齐心与齐智识说〉，《中兴日报》第2版（1907年8月24日）



党的纷争也可消解。何虞颂的态度暧昧也许是他后来转向《总汇报》任职的原因之一。

### 三、“小说论战”的三大主题

#### (1) 制度之争：立宪与革命的攻防

从前文《中兴日报》笔将田桐《与总汇报书》中可以看到，立宪和革命一直是论战的核心问题，因此，两报小说领域的论战也当然由此展开。

《中兴日报》率先发起攻击，相继刊登数篇小说对“立宪”一事进行贬低和斥责：1908年9月2日刊登《乞骨儿》，将祈求开国会之辈比作乞人，痛斥其没有风骨：

无恙生曰若而人者，其生有贱骨者欤？向人哀乞，以求得资，尚且不可，矧向异族政府以哀求，其自弃无限之君权，而还我以自由哉。然则今之哀求开国会者，皆乞人之类也。<sup>30</sup>

1908年9月7日的《发开口梦》又嘲笑保皇党想要开国会痴人说梦：

莲漏将阑，残灯如豆，忽闻有声自隔壁。呢喃而不可辨。忽大声曰‘快些去乞求立宪呀’略停，又大声曰‘快些乞求开国会呀’□其篇末云“老人曰：‘此不过发开口梦□何必理他。’于是众怒始息，其人已逃遁不知所之。”<sup>31</sup>

1908年11月14日《中兴日报》刊载《保囊主义》，嘲笑保皇党没有革命的勇气，认为革命者“以流血赚自由”，是一件险事，惟愿明哲保身，“非择最平稳之道路”：

某甲，震于革命之说，以为流血而赚自由，险事也。但世界进化，无所附属，则不得称为开通，是非择最平稳之道路而行不可。寻思良久，忽然心血来潮，自念革命二字未免骇人，不如保皇，不过发电哀求，即已尽其义

---

<sup>30</sup> 无恙生，《乞骨儿》，《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9月2日）。

<sup>31</sup> 佚名，《发开口梦》，《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9月7日）。

务，且时时可以同官场说话，何等体面如不如不见听，亦无后灾。于是决意附会保皇党。<sup>32</sup>

到了宣统朝，《中兴日报》依旧贯彻着小说工具性的宗旨，如1909年3月26日刊登的《新西游》，也很明显具有政治讽刺意味。文章写孙行者闹上天宫之事，将革命党首领孙中山则比为孙行者，将革命叙述神话化，而对康有为进行丑化。文里的“孙行者”一时在东京，一时又到了北京，显然是孙中山的动向。说“孙行者同这个康主帅又联合了，要合兵攻进天门。”此时正值清廷统治危机四伏，各地起义酝酿频发，有关革命党和保皇党是否联合的消息也层出不穷。但作者作为革命党对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认可的，他安排了一个“星君”反驳，对康有为的个人操守进行了抹黑：

我想这个康主帅是没用的人，不过那些不食鸭的人迷信了他，常常买些酒肉香烛楮帛之类。去孝敬孝敬。他只乐得享受。也无非是一个贪利之徒。我想这孙行者未必肯同他联合，下界的人每造谣生事，最喜撒谎，如今我天上也染了下界的恶习了。诸君不要信他罢。<sup>33</sup>

文中这些“星君”则代指朝廷不作为的官员，“后来孙行者打进天门，见他们这样的恭顺，也没有把这星君难为，依然是做他的星君。但不能由着他们乱受下界香火了。”这句话则暗指改朝换代，革命胜利后，他们依然可以做自己的官员，只要恭顺即可，这当然是革命党对革命胜利后的想象，此篇作为讽刺小说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

对于“革命”与“立宪”之争，《南洋总汇新报》则重点攻击了革命的正当性。1908年7月18日连载的《大话报》写了一个叫不通的人，经人介绍开办了所谓“革命”报纸《大话报》，借革命之名，引得富商参资入股，瓜分资金。《大话报》的报纸宗旨如下：

大话报章程：本报专讲大话，引人入信。务使人能被我骗倒，甘出钱财为宗旨。

本报既集股之后，可以不必邀股东之允准，可以独断行事。

---

<sup>32</sup> 佚名，〈保皇主义〉，《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1月14日）。

<sup>33</sup> 佚名，〈新西游〉，《中兴日报》第3版（1909年3月26日）。

本报担任办事之人，可以各存私见，尔推我诿，不求实力。

本报初以和平为宗旨，若集股之后届出版之时，宜变和平宗旨，为大话宗旨。股东如有不愿，亦可不恤，务须一力坚持，虽至大局破散，亦不稍为将就。本报所延主笔，对待之法有二。一则假公益之名，强主笔以当义务，陆续刻扣减少其薪水，一则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二语责主笔，庶使主笔绝食。居留无所，□亦不敢怨招待之无状。

本报开办之后，如资本不继，可以劝人捐钱，若将来获得余利，按股分派，与曾捐钱于本报者无与。

出版后，本埠各人，如不喜阅本报，或阅一二月推却者，本报即认为此人反对吾党宗旨。本报可以随时谩骂。或毁之为禽兽。或斥之为奴隶。<sup>34</sup>

宗旨中“专讲大话，引人入信”、“务使人甘出钱财”，讽刺所谓革命实为功利性敛财骗术，“独断行事”“办事者尔推我诿”的组织规则，则嘲讽他们不务实事，互相推诿，而且品德低劣，只要“不喜阅本报”，“可以随时谩骂。或毁之为禽兽。或斥之为奴隶。”

1908年8月7日刊登的《大话报迟迟出版之内容》写众人只会“纸上谈兵”，嘲笑他们要造一个“纸扎的新政府”：

大话报成立，初聘纸虎为编辑员，金谓每日报章，虽以大话为宗旨，第空诸倚傍，著笔颇难，须先立一新政府作视线云云。因极力运动，迄无效果，纸虎曰：“诸君如欲速成，仍是依我榜样，赶造纸札新政府为妙。”众曰：“昔者广西镇南关、云南临安府等役，人既以纸公笑之，今犹复蹈故辙乎？”纸虎曰：“世界上纸札封相、纸札美人、纸札阴宅，何尝不闹热一时，以掩生人眼界？”众服其言，议遂决。<sup>35</sup>

1908年9月8日刊载“劝”《美少年》，将革命党贬为“乱党”，其举动莫若儿戏，令诸华侨弃之：

怪史氏曰：所谓革命者？其怪象何多乎？他者勿论，即此演说一事，去腊曾派此传单，请人‘共聆雅诲’，届期而渺无踪影，华侨莫不诧异，而鄙弃之，以革命党举动之儿戏也。至今日又演此怪剧，岂真貌丑声嘶不敢演

---

<sup>34</sup> 毕，〈大话报〉，《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18日）。

<sup>35</sup> 谐，〈大话报迟迟出版之内容〉，《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8月7日）。

说耶？抑另有原因外人不得而知耶？或者曰：所谓革命党者实乱党也，以乱党而欲演说于大钟楼，必为此处政府所干涉矣。殆或然欤？<sup>36</sup>

## (2) 理念之争：金钱政治的互相指控

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未有之大变局”，立宪与革命两种政治主张的论争一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部分政治势力借机谋取私利的现实考量。从两报小说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均质疑对方“立宪”或“革命”诉求的救亡图存正当性。《中兴日报》认为保皇党是靠“保皇”谋取私利，所谓“立宪”不过是骗钱的把戏。《南洋总汇新报》也反击革命党“表面革命实为敛财，办报仅仅为了请人慷慨解囊”。

1908 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南洋总汇新报》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为光绪帝深切哀悼。革命党人却很高兴，《中兴日报》11 月 18 日和 19 日先是发表去非的论说《呜呼那拉氏又死》，表示载湉的死讯刚刚传到，西太后那拉氏的唁电又至，满族皇室的势力大大受损，“实幸其死得快也”。<sup>37</sup>除了政论，《中兴日报》更是在 11 月 18 日和 19 日连发两篇小说来嘲讽保皇党：

11 月 18 日的小说《保皇党真哭》作者署名“哈哈笑来稿”，显然是革命党愉悦心情的体现。文章写光绪帝死后，保皇党众人哀伤痛哭之景，说“如若光绪不死，我们尚望有回朝之日，骗术可易售，金钱可易得。虽挥霍如土，亦无所不可。今光绪死矣，我们棍骗之术无可推诿，则庚丁难捉。”然后众人痛哭，有人假心假意，哭不出，用“如意油”刺激眼睛，使其流泪，如果想知道此人是真哭还是假哭，看他的手巾上有没有擦“如意油”即可知道，如果没有如意油的气味，则说明是真的哭了，嘲讽保皇党众人皆趋炎附势之辈。<sup>38</sup>

这还不够，11 月 19 日《中兴日报》刊载《哭出个粤讴来了》写保皇党为光绪帝之死，痛哭哀悼，《总汇新报》不仅下了半截旗表示哀悼，还将报纸改为白纸印蓝字以表哀思，整条街都响彻着保皇党众的痛哭之声，有的人甚至哭丧像唱戏，“哭出一首粤讴来”。<sup>39</sup>

<sup>36</sup> 劝，〈美少年〉，《南洋总汇新报》，第 3 版（1908 年 9 月 8 日）。

<sup>37</sup> 去非，〈呜呼那拉氏又死〉，《中兴日报》第 1 版（1908 年 11 月 18-19 日）。

<sup>38</sup> 哈哈笑来稿，〈保皇党真哭〉，《中兴日报》第 3 版（1908 年 11 月 18 日）。

<sup>39</sup> 侠民，〈哭出个粤讴来了〉，《中兴日报》第 3 版（1908 年 11 月 19 日）。

面对《中兴日报》对其“保皇立宪”是否真诚的指摘，《南洋总汇新报》的回应则直指《中兴日报》借革命之名义大肆敛财，实则为了谋取私利。1908年8月12日连载的《中元夜宴》写革命党表面上打着革命、救国的旗号，实际上拿“革命事业”当借口继续纵欲享乐，毫无真正的理想与担当，为了继续行乐，竟约定“多方取人财命”：

灯光耀目，花香扑鼻，笙歌盈耳，酒肴适口。美哉某街之某酒楼。

时方入暮，手车马车，纷至沓来，门前喧扰。于时招待人客声、应酬朋友声、志士呜呼声、和尚喃喃声、一齐并起，喧作一片。

审而视之，酒厅上列坐数十人，类皆秃短头发，有宽袍大袖作日本装者、有短衣窄袖作欧美装者，偎红倚绿、笑语喁喁。噫嘻，志士饮花酒耶？和尚庆贺中元节耶？阔哉志士！异哉和尚！

有志士起而言曰：“诸君且慢取乐，听吾一言，窃自河口失败以来。□□票滞销，积欠花债，几无以应。幸有余资，尚可作中元之一局。过此以往，诸君宜振奋精神，多方取人财命，庶能行乐及时！”

和尚应曰：“吾有缠足妇，何患乎无家？但足下勉励之言，为吾人应尽之责任，敢不勉力从公？”<sup>40</sup>

前文提到的小说《大话报》，亦讽刺革命党之所以举办报纸，鼓吹革命，其真实目的实为敛财，小说开篇便直指革命党是借革命之名行敛财之实，兼顾杀人放火的勾当，“外假公益之名，内行欺骗之术”：

君亦知近年之失败耶，日日劝人捐钱，曰某日可以得某地，某日可以得某权。不转瞬间前言不效矣。捐钱者来索报酬，俱无以应矣。目全欺骗之手段，全然无效矣。何能办报。

不通笑曰：子何愚，子不知骗术日新，人不及察耶。有术在，子何恐子不能分也。然子须有以助我，包错愕然，叩以何术。

不通笑曰：今宜外假公益之名，内行欺骗之术，吾与子分途行动。觅商人之稍有资财，人品率直者，勉以附股，晓之曰，此公益事也，事若成，可得名誉也。以附股之故，而得名誉，何乐而不为。包错曰：子言诚是，然附股者，或不服我之欺骗宗旨何？不通笑曰：无忧，外托和平之名，则人

<sup>40</sup> 劝，〈中元夜宴〉，《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8月12-13日）。

皆乐从矣。包错乃怡然笑，拍掌赞成。迟几日，分头运动，迟几月，居然股份集成。<sup>41</sup>

在其办报宗旨里，同样堂而皇之写道：“本报专讲大话，引人入信。务使人能被我骗倒，甘出钱财为宗旨。”将革命党虚张声势、以谎言牟利的嘴脸讽刺得淋漓尽致。

### （3）转向失控的人格诋毁

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若说两报小说中围绕“革命与立宪”这一核心政治议题展开学理论证的作品在政治思想传播层面仍具一定历史价值，那么大量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互诋之作，通过丑化政敌形象、捏造私德问题等手段进行政治攻讦，则不仅严重偏离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提升小说地位的初衷，更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明显的低俗化倾向。这类作品将小说异化为政治谩骂的工具，既丧失了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格调，也削弱了其作为历史文献的客观性价值。

《中兴日报》在1908年10月2日的《哭皇天》中写保皇党之丑态，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写保皇党人哭声震天连绵不绝，邻人以为是妖怪，对其极尽讽刺：

如楚囚对泣，哭声震天，白日之黑为暗，但闻哭道：“皇呵皇呵，我保皇。皇不保我！好凄凉呵！”既而又哭道：“皇呵，我全靠保皇弄钱，如今皇打破我的饭碗，好阴功（粤语指倒霉、不幸）呵！”其时，细雨霏霏，哭声达入邻人之室，邻人叹曰：“夜深矣，雨云不散，道路泥泞，而乞人沿途哀号，奶奶太太声浪，震人耳鼓，扰我清梦，实属可恶，虽然叫花子，亦殊可怜。”乃命阍人以残羹冷饭给之，令之速去，毋得叫嚣。<sup>42</sup>

1908年10月14日的小说《大懵》将保皇党众人比作“大懵”和“小懵”，对他们的丑态进行嘲讽：

自虏廷宣布所谓宪法大纲后，大懵乃召集一群小懵，聚而读之，皆大欢喜。大懵曰：“如今立宪了，九年开国会了，我们的目的已达了。”群懵

---

<sup>41</sup> 毕，〈大话报〉，《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18日）。

<sup>42</sup> 佚名，〈哭皇天〉，《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0月2日）。

和之，欢声雷动，咸议举行纪念会。于是张灯结彩，仿照古荷叶制帽之法，以松叶织成“帝国国会万岁”六字。拍掌狂叫，竟夕喧闹，不知东方之既白。<sup>43</sup>

除了将己方领袖比喻成“孙大圣”，《中兴日报》还对保皇党领袖进行了妖魔化书写。1908年6月15日《中兴日报》刊载的《说怪物》将康有为描绘成“南海怪物”：

当狐祸未除，十余年前，岭表南海之区，西樵之麓，有一物出现，最足震人耳目者。该物为人形，性最淫，能言语，善解人意，造邪说以惑人，然咸恶之。思斥绝而后快，爰有无识之徒，迷信其说，不以为邪，反以为善。甚至三跪九叩首，执弟子礼而师事之，号之曰“圣人”。与人言亦不敢呼物之名，因其所产之处，而称之为：“南海”。<sup>44</sup>

前面卖足了关子，想必读者读到这里，对这个叫“南海”的怪物是谁，应该心中有数了。保皇党魁首康有为，正有“康南海”之称。

1909年4月27日转载的《蓄屁机》则用黄鼠狼比喻保皇领袖：

黄鼠狼，状如鼠，善攫鸡，有捕之者，则放屁如贯珠，其臭不可向迹。谚所谓黄鼠狼有四十九救命屁者是也。吾粤南海之康山，新会之梁山，三水之徐山各地，皆产是兽。前十年为长白山下老狐所逐，乃纷纷逃窜海外，于是乃繁生于金山日本星洲各地，人多苦之。<sup>45</sup>

此篇更是直指籍贯南海的康有为、籍贯新会的梁启超和籍贯三水的徐勤为黄鼠狼，被“长白山老狐”（慈禧）驱赶出境，逃亡金山、日本、新加坡等地。影射康梁在香港、新加坡宣传时仿照西方人使用录音机机大放厥词，类黄鼠狼“蓄屁”。

除了对康有为和保皇党进行攻击，《中兴日报》还刊有排满拥汉的小说。如1909年6月1日《作如是观》便是骂先祖居于长白山的满人是猪和野人之女所生的后代：

---

<sup>43</sup> 佚名，〈大槽〉，《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0月14日）。

<sup>44</sup> 慕汉，〈说怪物〉，《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6月15日）。

<sup>45</sup> 滑稽子，〈蓄屁机〉，《中兴日报》第3版（1909年4月27日）。

猪亚满，字省三。别号东隅老叟。其先世原在长白山麓聚狼村居住，始祖曰猪雍顺。来历颇不明白，或云所以姓猪之故。系长白山上有野人女，独居深处，与世不相往来，遂夜郎自大，称为山姬。邻洞有老猪精修行多年，颇有道数，能变化为人形。四肢头面，莫不相类。独猪尾不能掩藏。每当夕阳西下，遨游山洞，见野人女以为同道，遂与接谈，情投意洽，相见恨晚，自是成为知己。

然而这并不是篇单纯的精怪逸事，其目的依然是抨击保皇立宪，篇末道：

看官试想一下，等到第九年开国会的情形，是这个样不是呢？我想预备立宪的话自从说起到如今，已经差不多五年了，还不是同五年前一个样。请问那一件事情是有进步的，或是改良的呢？将来到了九年，还不是像现在的光景。俗语说的好，叫做狗口何曾出象牙，这一句话就可圈可点了。……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引长那条颈子，望他九年开国会，这不是痴人说梦吗？<sup>46</sup>

对于《中兴日报》来势汹汹的攻讦，《南洋总汇新报》也不遑多让，迅速回应，先对《中兴日报》整个报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1908年7月7日刊登的《吓坏留学生》，写《中兴日报》众人胆小如鼠，不敢阅读《总汇新报》的报纸，丑态百出的样子：

候《总汇新报》派到，以别报覆其上，双手递去。某某接看，再为披阅，则总汇新报四字，突现目前，倒退地上，视之已晕去，众急救之。仍由大胆者拼命取来覆看，则正张无别言，又急以告众，众又争看，至附张某段，小厮从旁高声朗诵，众闻言皆魂飞魄散，没命飞跑。至吉宁街十里外，始敢停步，私议曰：“不图今日之攻击如此其甚也！三千毛瑟，真可畏哉！”语毕，众人审视，不见貌似水手者何在，诧曰：“何彼此次如是之胆大耶？即倩人往看，则吓坏矣。”<sup>47</sup>

---

<sup>46</sup> 铁汉，〈作如是观〉，《中兴日报》第4版（1909年6月1日）。

<sup>47</sup> 劝，〈吓坏留学生〉，《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7日）。



“不图今日之攻击如此其甚也！三千毛瑟，真可畏哉”这句话写《总汇新报》的政论杀伤力之强，《中兴日报》馆众读罢吓晕在地。

1908年7月10日刊登的《照方服食》，用中医药隐喻毒害读者，将中兴日报馆描绘成“一股戾气直冲霄汉，中有病者，呻吟之声达户外”之地，病者按照报纸上的药方抓药，“照方服食”，药方却与中兴日报主笔田桐（恨海）和胡伯骥（神骥）有关，先食“华侨之血汗”，觉得十分美味，又食“田桐”，最后食到一股腥臊之味，原来是骥尿，笔锋含沙射影，借开药之名行人身攻击之实。<sup>48</sup>

1908年7月28日刊登的《恨恨恨》，更是通篇激愤之辞，甚至喊出了“开战！”之语，塑造出革命派“疯癫”的形象：

光天化日之下，忽有伪充志士，西其装，断其发，形如水手其人。由东洋一跳，跳至南洋；又一跳，跳入终衰报，谬充终衰报记者。立脚未定，风土人情均未悉，即跳上跳落，谬谬然以通人自命，欲小觑人。

某日，得阅□□报。忽尔发狂，状类疯癫，向猪狗禽兽而大号曰：“恨恨恨！口口报议论光大，咄咄迫人，了不得！恨恨恨！□□报日以正言挑我诡术，我等诡骗华侨之术破矣，了不得，了不得！”猪狗禽兽曰：“吾辈之生涯，不过欲先骗同胞之钱，再骗同胞之命耳，□□报出言提醒，如之何？”恨记者曰：“开战，开战！”<sup>49</sup>

《南洋总汇新报》刊登的这几篇小说内容多激愤辱骂之词，结合《南洋总汇新报》在接收到《中兴日报》的连番挑衅后选择于1908年6月29日改名《南洋总汇新报》，并在7月接连刊登了五篇小说，可见这几篇小说均为对《中兴日报》的回应。

1908年7月29日刊登的《纪侦探申与堡事》，写吉宁街（《中兴日报》所在地）里有一群怪物，“肉食”、“猪倌”、“鬼马”、“光壳”、“恨害”、“疫神”、“和尚”、“聋僧”、“酉鬼”等。其中，“恨海”乃是中兴日报主笔田桐的笔名，作者对“恨害”（恨海）屡作丑化，说他大哭，还“泪湿青衿”。其他怪物虽不能一一对应，想来也各有影射。<sup>50</sup>

1900年代中后期的新加坡是革命派与保皇派思想交锋的重要阵地，在此背景下，《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中常见的“人格诋毁”现象，可视为特定

<sup>48</sup> 劝，〈照方服食〉，《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10日）。

<sup>49</sup> 毕来稿，〈恨恨恨〉，《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28日）。

<sup>50</sup> 劝，〈纪侦探申与堡事〉，《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29日）。

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首先，在政治层面，报刊论战以削弱政敌政治影响力为核心目的，对私德的攻击可以瓦解对方的道德合法性。其次，在文学观念层面，受梁启超“小说为改良社会之工具”观念影响，以《中兴日报》为首的南洋报刊将小说视为政治宣传与民众动员的利器，导致文学审美让位于政治功能，“人格诋毁”成为小说工具化的具体表现。再者，从社会心理来看，南洋华人社会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公众人物的“私德”直接关联其政治信誉，报刊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渲染政敌道德瑕疵，以调动读者情绪、引导舆论。

诸多因素驱使下，革命党与保皇党可谓将“小说的工具性”利用到了极致。小说在他们手中仿佛变成了你争我斗的檄文，影射对方的工具，创作小说的目的也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在《南洋总汇新报》的笔下，《中兴日报》社众主笔都是青面獠牙，口出污言秽语的怪物，而在《中兴日报》的笔下，保皇党又成了哀求立宪，“大懵”“小懵”的可怜虫。1910年2月《中兴日报》停刊后，《星洲晨报》成为革命派在新加坡剩存的唯一宣传机关，接替了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的使命。如《癡圣人》继续诋毁康有为，将其称为“迷恋功名”，“日端敛财”的人。<sup>51</sup>

当然，《中兴日报》所刊小说并非全然为了政治目的，其中涌现出了一些艺术性较强的作品。如虎军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天汉世民的《金锁连环》等。但这些“艺术”的尝试，仅是源于作者本人的个人审美意趣，这一时期政治小说的创作，仍然成为了报刊小说的主旋律。

纵观1907年至1910年间两报所刊登政治小说的数量，《中兴日报》在整个时期内均保持了一定数量的政治小说刊载，直至1910年停刊；而《南洋总汇新报》的政治小说则主要集中在1908年。据此，亦可看出两报主编对小说选取的倾向，以及对“小说工具性”的倚重程度。《中兴日报》在创刊初始便有着“小说改良社会之活宝”的明确纲领，因而持续刊载政治小说；相比之下，《南洋总汇新报》仅在1908年6月前后集中刊登了数篇政治小说，1909-1912年间，该报仅零星刊载了两篇政治小说，可以认为，《南洋总汇新报》对政治小说的刊登固然包含宣传自身政治立场的考量，但更大程度上是出于1908年论战期间反击《中兴日报》的策略需要。

---

<sup>51</sup> 慧观，〈癡圣人〉，《星洲晨报》第6版（1909年12月8日）。

#### 四、滞后性繁荣的背景因素

前文提到，在大陆小说已经从“开口见喉舌”的浪潮中逐渐消退时，南洋报刊小说方迎来了小说政治功用的井喷。为何晚清南洋小说从旧小说到新小说的转换与中国大陆存在着滞后性呢？若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新小说”诞生之始，便承担着“启蒙民智、革新社会”的社会责任，这与文学天然的审美属性是相悖的。因此，当“新小说”的潮水回落，中国的小说又有回归通俗小说追求审美的态势。梁启超之所以极大地提高小说的地位，鼓吹小说的社会功用，是因为他将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妄图“以小说救中国”。当康梁孙相继流亡南洋，革命党与保皇党论战的中心也来到了新加坡，因而催生出了此时的报刊小说。这些小说既是两党之间口诛笔伐论战的武器，也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南洋回响。正因为这些报人接受了“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思想，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如王斧、何虞颂等职业报人来到新加坡时，才会在这里的报刊上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用小说来启蒙民智，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也因此，造就了此时南洋报刊小说独特的特征——在中国小说已经背离“开口见喉舌”的政治小说，转身拥抱通俗时，南洋报刊小说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强调与小说工具性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浪潮并非一次性抵达南洋，其影响过程可划分为两个主要的波次。第一次是1905年《檳城新报》附张“益智录”的设立，源于要刊登“救国小说”，这应该是南洋报刊受到“小说界”革命自发的感召，因而比中国大陆的“群山响应”之势晚了三年有余；第二次则是王斧、何虞颂一众接受了小说界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拥有创作“时新救国”的“新小说”创作经验的南来报人，他们的到来为南洋报刊小说带来了新鲜之气，他们与政治追求紧密相关的小说创作纲领也影响了自己主编报刊对小说的选择，因而影响了此地报刊小说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王斧、何虞颂等人多为中国大陆早期投身维新或革命宣传的报人，曾参与过报刊编辑、政治小说创作或革命舆论动员，具有明确的办报理念与政治立场。他们南来南洋后，并未因环境变化而放弃原有理念，而是有意识地选择继续以小说为工具，参与政治论战，推动社会启蒙。这种编辑经历与思想立场的延续性，是南报刊小说保持政治功能导向的重要原因。

南洋报刊政治小说之所以呈现出与中国大陆文学发展不同步的“滞后性繁荣”，其成因可归结为政治生态、社会关切与文化传承三方面因素的叠加效应。首先，新加坡聚集了大量政治流亡者，在清廷严密控制舆论的背景下，华文报纸为他们提供了独立于大陆又相对安全的发表政见的场域，南洋成为革命与保皇思

想交锋的“飞地”。报刊论战既是政治角力的重要平台，其激烈的竞争也导致话语策略不断极端化。在此情境下，政治小说因其通俗传播优势和极强的工具性，成为了论战白热化之际的必然产物。其次，新加坡华人社会对故国政治的持续关注，为政治小说提供了稳固的生存空间。南洋华人虽身处殖民地，但对清廷动向、革命进程乃至国家前途保持高度关切。报人敏锐地意识到，小说不仅是文学，更是启发民智、引导舆论的重要媒介，因此持续刊载具有政治启蒙与教育意义的作品。南来文人群体遵循梁启超“小说救国”理念，并及时顺应中国大陆小说通俗化的转型趋势，而是将小说视为救国工具，并在新加坡这一特殊场域中，有意识地延续了这一使命，拒绝随波逐流转向通俗娱乐。以上三个因素，合力使新加坡成为政治小说最后的实验场，呈现出与中国大陆文学发展不同步的“滞后性繁荣”特征。

## 五、结语

与浓厚的政治色彩相比，此时的南洋报刊小说的艺术成就略显逊色。当然，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转型，也诞生在社会时局的巨变中，但能将“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这一思想践行得如此极致，这一时期的南洋报刊小说当属特例。彼时中国内地许多报刊为求生存或迎合市场，逐渐转向通俗文学，而南洋报刊小说却在同样面临时代变迁的情境下，坚守政治立场，强化小说的启蒙与斗争功能。

这些艺术性薄弱但政治性强烈的小说，上承晚清政治小说传统，下启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承上启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它们一方面将文学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另一方面，其强烈的现实介入精神与在地关怀，不仅为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早期范本，更在中国文学从传统“文以载道”向现代启蒙话语转型中，构成了兼具断裂性与延续性的海外节点。

可以认为，南洋报刊小说的“滞后性繁荣”并非被动滞后，而是南洋报人在复杂历史情境下做出的有意识抉择。当时中国国内报刊小说正快速通俗化，大量具有文艺审美价值的作品涌现并广泛传播，这些作品同样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南洋，但南洋报人却坚持刊载具有强烈政治功能与道德批判色彩的小说，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海外政治舞台，以小说宣传自身立场，践行着中国文人“主持公论”“传播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洋报刊小说呈现出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成为观察文学与政治、本土与离散、启蒙与市场复杂关系的独特窗口。南洋地区特殊的“滞后性繁荣”现象，更是在全球化早期

媒介生态中，海外华人通过文学实践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独特样本，为理解近代文学的跨国流动与在地转化提供了关键注脚。

## 【征引文献】

### 一、专著

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张永福，《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二、期刊

牛志威，〈晚清王斧小说考〉，《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1期，页183-192。

### 三、学位论文

黄曼，《晚清“海归”与小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博〉，2013。

李亚娟，《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1902-1911）》，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博〉，2009。

### 四、报章文献

毕，〈大话报〉，《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18日）。

毕来稿，〈恨恨恨〉，《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28日）。

沧桑杂录，〈立宪梦〉，《中兴日报》第5版（1907年10月26日-28日）。

斧军，〈斧军说部经已出版〉，《中兴日报》第6版（1908年3月23日）。

斧，〈想入非非〉，《中兴日报》第5版（1907年8月20日）。

斧，〈总汇报记者何虞颂十大罪恶〉，《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5月5日）。

广博，〈亚警确不自量〉，《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7月31日）。

哈哈笑来稿，〈保皇党真哭〉，《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1月18日）。

滑稽子，〈蓄屁机〉，《中兴日报》第3版（1909年4月27日）。

慧观，〈癫圣人〉，《星洲晨报》第6版（1909年12月8日）。

恨海，〈与总汇报书〉，《中兴日报》第2版（1908年6月10日）。

来函，〈总汇报记者何虞颂之丑相〉，《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5月2日）。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于《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1，页14-19。

慕汉，〈说怪物〉，《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6月15日）。

去非，〈呜呼那拉氏又死〉，《中兴日报》第1版（1908年11月18-19日）。

- 劝,〈吓坏留学生〉,《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7日)。
- 劝,〈照方服食〉,《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10日)。
- 劝,〈纪侦探申与堡事〉,《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7月29日)。
- 劝,〈中元夜宴〉,《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8月12-13日)。
- 劝,〈美少年〉,《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9月8日)。
- 铁汉,〈作如是观〉,《中兴日报》第4版(1909年6月1日)。
- 侠民,〈哭出个粤讴来了〉,《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1月19日)。
- 谐,〈大话报迟迟出版之内容〉,《南洋总汇新报》第3版(1908年8月7日)。
- 无恙生,〈乞骨儿〉,《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9月2日)。
- 玄理,〈清廷又欲禁报耶〉,《中兴日报》第2版(1907年8月23日)。
- 玄理,〈齐心与齐智识说〉,《中兴日报》第2版(1907年8月24日)。
- 佚名,〈答叻报主笔三十日所覆本报书〉,《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3月3日)。
- 佚名,〈发开口梦〉,《中兴日报》第5版(1908年9月7日)。
- 佚名,〈哭皇天〉,《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0月2日)。
- 佚名,〈大懵〉,《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0月14日)。
- 佚名,〈保囊主义〉,《中兴日报》第3版(1908年11月14日)。
- 佚名,〈新西游〉,《中兴日报》第三版(1909年3月26日)。
- 张永福、陈楚楠。〈本报启示〉,《中兴日报》第2版(1908年5月6日)。